

■文学·艺术研究

论史传对《搜神记》的影响

弋朝乐

(商洛学院语言文化传播学院, 陕西商洛 726000)

摘要:作为成熟较早的叙事文体,史传对志怪小说《搜神记》有着多方面的影响。首先,史传的实录精神对干宝辑录《搜神记》的态度影响较大。实录精神不仅体现在干宝对材料的处理上,还在于他采用了史传常用的全知视角。其次,史官“究天人之际”的创作目标也对《搜神记》影响较大。干宝不仅仅对神异的事件进行记录,而是立足于现实,力图解释这些事件与历史兴废的关联,探究历史发展的规律。再次,史家“惩恶扬善”的道德观念也对《搜神记》有着影响。最后,以人物为中心、叙述干预、语言简洁等史传叙事笔法也对《搜神记》影响较大。

关键词: 史传;《搜神记》;影响

中图分类号: I207.41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770X(2016)12—0096—06

PDF 获取: <http://sxxqsfxj.ijournal.cn/ch/index.aspx>

doi: 10.11995/j.issn.2095—770X.2016.12.022

On the Influence of Historical Biography On Sou Shen Ji

YI Chao-le

(College of Languages and Cultural Communication, Shangluo University, Shangluo, Shaanxi 726000, China)

Abstract: Historical biography, the early works written in mature narrative style, exerts great influence on Sou Shen Ji in many aspects. Faithfulness to the truth in historical biography greatly influences the attitude of Gan Bao's compiling of Sou Shen Ji. This can be seen in his disposal of materials. Historiographers' writing target of "studying the relation between human being and nature" also influences the composition of Sou Shen Ji. Gan Bao not only presents the mysterious tales faithfully, but also tries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ose tales and the changing of history. Gao Bao is also influenced by historians' moral ideas and the ways of expression in history biography.

Key words: historical biography; Sou Shen Ji; influence

《搜神记》是一部搜神记异的志怪作品,其作者是东晋著名史学家干宝。不同于史书,这本书中记录的绝大多数是神鬼怪精故事,内容驳杂,有些甚至荒诞不经。但从主观上讲,干宝辑录这些故事并非出自好奇心理,而是有感而发,对神道深信不疑,并采取了与史传文学相同的实录态度。从客观角度来看,史传文学作为发端较早的叙事文体,已经有了深厚的积淀并且在当时已经发展得较为成熟,而同属叙事文体的志怪小说此时并未形成自觉、独立的观念,因而在创作中必然会受到史传文学的影响。“由

于脱胎‘史传’未久,其无论于创作观念还是行文笔法,都深受‘史传’影响”^[1],其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实录的著作精神

实录是史书书写的基本要求。从孔子开始就非常强调和赞扬史家的这种精神。“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2],再到司马迁,实录被看做良史的必备品质。班固《汉书·司马迁传》中写刘向、扬雄称赞司马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

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3]2738}作为史官的干宝,对《搜神记》所载的鬼怪之事本持客观实录的态度。

关于干宝著《搜神记》的起因,《晋书·干宝传》中记载:

宝父先有所宠侍婢,母甚妒忌,及父亡,母乃生推婢于墓中。宝兄弟年小,不之审也。后十余年,母丧,开墓而婢伏棺如生,载还,经日乃苏。言其父常取饮食与之,恩情如生,在家中吉凶辄语之,考校悉验,地中亦不觉为恶。既而嫁之,生子。又宝兄尝病气绝,积日不冷,后遂悟,云见天地间鬼神事,如梦觉,不自知死。宝以此遂撰集古今神祇灵异人物变化,名《搜神记》,凡三十卷。以示刘惔,惔曰:“卿可谓鬼之董狐”。^{[4]2150}

从这段记载可以看出,干宝对人死而有灵、预言吉凶、鬼神异变等现象的认识来自于身边亲人的亲身体验,这些事件的耳濡目睹让他对神祇灵异、人物变化深信不疑,所以搜集了古今灵异的事件,辑录而成《搜神记》,刘惔也因此评价干宝为“良史董狐”。“从作者的创作态度看,此类著作主观上均以忠实载录为鹄的。尽管所记之事有时很奇怪,但这奇怪并不是作者自己的发明,而是传闻本来如此,作者只是把它原原本本地记下来,也很少另作发挥或增衍。就是说作者的创作态度也近于史而不近于文。”^[5]

干宝在《搜神记·序》中交代了材料的来源和自己对这些材料的观点:“虽考先志于载籍,收遗逸于当时,盖非一耳一目之所亲闻睹也,亦安敢无失实者哉!……今之所集,设有承于前载者,则非余之罪也。若使采访近世之事,苟有虚错,愿与先贤前儒,分其讥谤。”^{[6]19}其材料来源主要有二:一是前人典籍的记载,二是采访于时人。对于这些材料的真实性,他认为:这些读来和听来的材料不是自己亲耳听到、亲眼看到,故不敢说没有失实。并且典籍记载难免有谬误之处,如果谬误出自于前人,那不能怪罪他,如果是谬误出自于自己的采录,那么希望把这些错误与前人的分开。

如“鲁少千”条所记:

鲁少千,山阳人。汉文帝微服怀金过鲁少千,欲问其道。少千拄金杖、执象牙扇,出应门。^{[6]35}

在这条记载里,鲁少千的奇异之处在于他能预知皇帝将要来访。但是他为什么不愿意和汉文帝见面?为什么又要“拄金杖、执象牙扇”出走,是不是预知汉文帝“怀金”,以此来表现自己对钱财的不屑?

这些作者没有做一个字的解释,仅仅记录了汉文帝过鲁少千,而少千不见的基本事实,对于其中的原因不做妄度。

从以上可以看出,干宝既对神怪之事深信不疑,却又清醒地认识到记录中难免会有失实之处,所以力求客观。这正是史传作家对材料处理的要义,也是《搜神记》“实录”精神的体现。

这种实录态度还体现在《搜神记》的叙事视角上。

《搜神记》的叙事大多采用了全知视角的方式,这种视角有利于作者以局外人的身份从宏观上把握整个事件的起因、经过、结果,从而能将整个事件的方方面面完整而清晰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如“三王墓”^{[6]410},这个故事是由干将,莫邪,赤比,楚王,客等五人的经历联接而成,而这五个人并没有贯穿始终的联系。如果采用限知视角或内视角,那么这个故事就很难连贯,作者采用了全知视角的方式,以局外旁观者的身份就很容易宏观地把握整个事件,一个人的经历写完就很自然地连接到下一段经历,并且在整个事件叙述完之后讲述“三王墓”名称的来历以及其所在地。这样使得叙事条理清晰,故事完整又重点突出。

此外,全知视角还利于打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把一些表面上看起来不相关的事件联系起来,发现其间的联系。如“豫章男子”:

汉建平中,豫章有男子化为女子,嫁为人妇,生一子。长安陈凤曰:“阳变为阴,将亡继嗣。”生一子者,将复一世乃绝也。故后哀帝崩,平帝没,而王莽篡焉。^{[6]190}

男子化女,嫁人生子的事件发生在汉哀帝建平年间的豫章,议论此事的陈凤身在长安,王莽篡位发生在汉平帝之时。三个事件发生在不同的时空之中,作者采用了全知视角把这三件事联系在一起,用陈凤的议论点化男子化为女子的预示意义,用王莽篡汉来验证这个预言,从而发现事件与历史之间的联系。

“源远流长的历史叙事,在总体上是采取全知视角的。”^[7]历史事件错综复杂,千头万绪,史传作家必须从宏观上把握这些事件,才能理出事件的线索,把握事件的因果联系。所以他们从总体上采用全知视角,总览历史事件的全局,可以清楚地掌握事件中的主次因素以及其间的逻辑关系,从而清晰地描绘出事件发展的进程。同时使用局外人的视角,可让叙

述者和事件本身拉开距离,使叙述出的事件显得更加客观。干宝本身就以客观的态度对待他所叙述的事件,史官的身份又天然地使他在叙述过程中侵染了史传文学“实录”的精神。

二、“究天人之际”的著作目标

李泽厚先生在《说巫史传统》一文中说:“中国文明有两大征候特别重要,一是以血缘宗法家族为纽带的氏族体制(Tribe System),一是理性化了的巫史传统(Shamanism rationalized)。”^{[8]5-6} 在人类活动过程中,随着人们认识水平的提高和生活经验的增长,“巫术活动中的非理性成分日益消减,现实的、人间的、历史的成分日益增多和增强,使各种神秘的情感、感知和认识日益取得理性化的解说方向。”^{[8]25}

巫的职责是沟通天人,他们力图对各种神秘现象与人类社会的关系做出解释。而史由巫演进而来,所以后世的史官理性成分虽然在不断增加,但受制于社会认知水平和巫史传统,他们在记事时仍带有浓烈的神秘色彩。《左传》中就有大量此类事件的记录,如:

(昭公二十四年)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梓慎曰:“将水。”昭子曰:“旱也。日过分而阳光犹不克,克必甚,能无旱乎?阳不克莫,将积聚也。”^{[2]1451}

(昭公二十三年)八月丁酉,南宫极震,莒弘谓刘文公曰:“君其勉之!”

先君之力可济也,周之亡也,其三川震。今西王之大臣亦震,天弃之矣。”^{[2]1446}

从以上两则记载可以看出,史官已经努力地想从理性的角度去解释奇异的自然现象。对于日食所预示的自然灾害,昭子认为已过春分,本来阳气该盛,却被属阴的月所遮蔽。阳气聚积,一旦勃发,必然大旱。昭子从阴阳平衡的角度力图去揭示日食与旱灾的关系。如果说这种解释还是陷于神秘之中,牵强附会,那么莒弘的议论则是从历史事实的角度进行类比论证,运用历史经验,也更加理性。同一件事,在《国语》中也有记载:

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阳父曰:“周将亡矣!夫天地之气,不失其序;若过其序,民乱之也。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烝,于是有地震。今三川实震,是阳失其所而镇阴也。阳失而在阴,川源必塞;源塞,国必亡。夫水土演而民用也。水土无所演,民乏财用,不亡何待?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是岁也,三川竭,岐山崩。十一年,幽王乃

灭,周乃东迁。^[9]

在这段记述中,伯阳父对地震与西周灭亡关系的论述包含以上两种方法。首先用阴阳平衡的观念解释了地震产生的原因,其次把地震与水土的关系联系起来,而水土出产是老百姓衣食所用之源,所以地震引起的“塞源”会导致百姓贫乏,百姓贫乏自然引起亡国,这一步的推论已经和现实联系起来了。而后又列举了伊水、洛水干涸引起的夏亡,以及黄河枯竭与商朝灭亡进行史实例证。

干宝本就把《搜神记》中的材料当作客观事实来记录,作为史官,同时他又力图从这些神秘的事件中发现王朝兴废的规律。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赤厄三七”:

汉灵帝数游戏于西园,令后宫嫔女为客舍主,身为商贾,行至舍间,嫔女下酒,因共饮食,以为戏乐。盖是天子将欲失位,降在皂隶之象也。其后天下大乱,遂传古志之曰“赤厄三七”。三七者,经二百一十载,当有外戚之篡,丹眉之妖。篡盗短祚,极于三六,当有飞龙之秀,兴复祖宗。又历三七,当复有黄首之妖,天下大乱矣。自高祖建业,至于平帝之末,二百一十年,而王莽篡位,盖因母后之亲。十八年而山东贼樊子都等起,实丹其眉,故天下号曰“赤眉”。于是光武以兴祚,其名曰秀。至于灵帝中平元年而张角起,置三十六方,众数十万人,皆是黄巾,故天下号曰“黄巾贼”……自光武中兴至黄巾之起,未盈二百一十年,而天下大乱,汉祚废绝,实应三七之运也。^{[6]194}

本则所论事迹虽起自灵帝游戏无度,但却涉及整个汉王朝的建立与灭亡。汉灵帝自降身份,扮作商人游乐,其后爆发黄巾之乱,乃至汉朝灭亡。干宝将动乱、灭亡的历史与灵帝扮作商人的事迹印证,找出了皇帝到商人这一游戏性质的事件与皇帝到皂隶这一史实的对应关系。并把“三七”之数与王莽篡权,刘秀复兴,黄巾之乱的时间相印证,虽然出于附会,想要论证传说和预言的真实性。但其中也包含了想从历史经验出发,探究历史规律的一面。

《搜神记》中还有些并无神异色彩的故事,如:

景帝以后,衣服之制,长上短下。又积领五六,而裳居一二。上饶奢,下俭逼,上有余,下不足之妖也。故归命放情于上,百姓惻于下之象也。^{[6]211}

类似这种把不合常规的历史现象与日后的动乱联系起来的记录很多,如《夫妇相食》、《衣服车乘》、《五兵佩》、《晋世宁舞》等,干宝把上下、阴阳、反正与君民、治乱相象征,采用倒推的方法,用日后的历史

事实来验证这些事件,发挥其预示意义。干宝追溯旧事,附和历史,意在探究历史现象和历史规律之间的联系,只不过这种探究出于象征附会,因而陷入了神秘之中。

总之,干宝不仅仅对神异的事件进行记录,而是立足于现实,力图解释这些事件与历史兴废的关联,探究历史发展的规律,这正是司马迁“究天人之际”的史官使命感的体现。

三、戒恶扬善的道德观念

中国自古重史,史学家们希望通过自己的史学观念来干预社会,他们通过著史来总结社会发展规律、倡导伦理价值、和谐人际关系,而史学家的观念来自于当时的哲学思想。冯友兰先生认为中国的哲学是“义理之学”,其方法非求知识之方法,乃修养之方法,非所以求真,乃所以求善之方法。^[10]在其影响之下,中国的史学著作具有强烈的是非观念和善恶观念。

孔子著《春秋》,意在维护周礼、匡正人伦,所以在记事中寄寓了强烈的褒贬色彩。这种“春秋笔法”起到了极大的警世作用,也为后世的史家传承。范宁在《春秋谷梁传序》称其“一字之褒,宠逾华袞之赠;片言之贬,辱过市朝之挞”^[11],司马迁也称赞其“《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12]^[1943]因此,在他的《史记》中充满了正义感和感情色彩,“在司马迁的心目中,历史一定有所刺讥褒贬,他认为这是孔子的遗教。”^[13]

刘勰总结了中国史书戒恶扬善的传统,他在《文心雕龙·史传》中说:“史肇轩黄,体备周孔。世历斯编,善恶偕总。腾褒裁贬,万古魂动。”^[14]做为史官的干宝,以实录的精神来辑录鬼怪故事,要“发明神道之不诬”,也要借此戒恶扬善。

干宝对神怪的态度是敬而远之。

在《狸神》一则中就记录了一个人神相敬的故事,刘伯祖家有一老狸,能预言其升迁,伯祖也对其恭敬有加。后伯祖升迁,老狸常向其泄露朝中消息,伯祖因惧怕家中有神而获罪,老狸为了不连累伯祖自愿离开。这则故事以皆大欢喜收尾,而这个结果是建立在人神相敬的基础上的。因为有灵异存在,所以人不应滥杀无辜,否则就会在无意间惹祸上身。如《土人陈甲》中,陈甲出猎,射杀长六七丈余五色蛇。三年后,于故地谈起此事,晚上梦见一人前来问罪,自称是被陈甲三年前射杀的长蛇,陈甲第二天腹

痛而死。相反,人如果帮助了神怪,也会得到好报,如孙登医治病龙,得龙降雨赐井以解干旱。又如苏易为虎接生,得虎衔肉报答。此外还有病龙、玄鹤、鱼、犬、黄雀等报恩的故事体现了善恶有报的观念,“但这里表现的主要不是佛家观念,常常表现的是人民的善恶观,肯定善良而否定邪恶。”^[15]^[304]

在《安阳亭》、《宋大贤》、《庐陵亭》等篇中还记述了人战胜鬼怪的故事。故事的情节基本一致:有妖怪害人,无人能止。有一路过之人,止宿于此处,夜半时有鬼怪出现,该人机智应对,得知鬼怪的本来面目与弱点,最后制服鬼怪,为地方除害。在这些故事里,鬼怪害人,人也可以制服鬼怪,但需要的是正气与胆量。相反,如果人本身有邪念,便会被怪所害。

还宣扬了孝义、诚信等儒家所倡导的道德品性。如《丁兰》:

丁兰,河内野王人。年十五丧母,乃刻木作母事之,供养如生。兰妻夜火灼母面。母面发疮。经二日,妻头发自落,如刀锯截,然后谢过……后邻忿兰,曰:“枯木何知。”遂用刀斫木母,应刀血出。兰还号,乃殓殓,造服行丧。仇报,廷尉以木减死。宣帝嘉之,拜太中大夫。^[6]^[135]

丁兰用木头刻的母亲能受伤流血,丁兰的孝心也能得到母亲的感应,并且丁兰也因为尽孝而被封官。又如《阳雍伯》中的阳雍伯为人孝顺诚实,朴实善良。为人补鞋不收费,把家安在埋葬父母的山上,不以八十里为高远,不以无水为不便。且推己及人,行车汲水作义浆以给行人。他这种至孝至诚之心打动神灵,种石得玉,改变了命运,娶妻拜官。好人有好报。《搜神记》中的这类故事很多,如《糜竺》、《蚕马》、《张璞》、《张嵩》等,通过神异的故事肯定、宣扬了诚恳有信、好施有义、节制讲礼等品质,教化色彩极为明显。

总之,《搜神记》虽然是搜神记异之作,但干宝的着眼点仍在于人间。他迷信鬼神天命,在因果报应的前提下探讨在人怪关系中人的原则与本分,起到戒恶扬善的作用。这和史传的道德评判传统是一致的,并且这种因果自有报应的怪异故事可能比史传的说教更有力量。

四、叙事模式

《搜神记》述异记怪,干宝在序中称其材料来源是“承于前载”和“采访近世之事”。采访近世之事必须经过干宝自己的加工与组织,“即使是承于前载,

也常常不是简单地抄袭,而是根据不同的记载或世间所传,进行补充和加工。”^{[15]292}《搜神记》的叙事笔法在很多方面受到了史传的影响。

首先,以人物为核心的叙述策略。

《汉书·艺文志》曰:“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3]1715}《史记》之前的史书或偏重记言或偏重记事,但都以事件为核心,围绕事件展现人物的言行。这种记事手法不利于展现人物全貌,没有对人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给予足够重视。而司马迁开创了纪传体的体例,梁启超认为《史记》“最异于前史者一事,曰以人物为本位。”^[16]纪传体以人系事,以人物为核心,有利于人物形象的完整化和丰富化,也有利于展现人物命运复杂成因,这种体例为后世大多数史家所接受。

《搜神记》记事大多是一则一事,是零碎的、片段的。但干宝在记述事件时,会尽力把经历事件的人物写得具体准确。这在其神化篇中体现得最为明显,在展开叙述时,一般以人物的生平介绍开篇,形成“某者,字某,某地人也,家世如何……”的模式,这和史传的纪传体模式是一致的,通过人物的准确可靠来增强叙事的真实性和可信度。如《崔文子》:

有崔文子者,学仙于子乔。子乔化为白蛭,而持药与文子。文子惊怪,引戈击蛭,中之,因堕其药。俯而视之,王子乔之尸也。置之室中,覆以敝筐。须臾而化为大鸟。开而视之,翻飞而去。^{[6]28}

本则记述了一个凡人崔文子和一个仙人子乔的故事,从神异的角度来说,仙人子乔才是故事的主角,但作者却选择从凡人崔文子入手,用他的见闻来写出子乔的神异。以凡人为叙述者,增强了故事的真实性。

《搜神记》中还有一些篇幅较长的作品,围绕某一中心人物连缀多个事件,多个事件的组合使得人物形象完整、丰满。如《丁姑》:

淮南全椒县有丁新妇者,本丹阳丁氏女,年十六适全椒谢家。其姑严酷,……以九月七日自经而死。遂有灵响,闻于民间。发言于巫祝曰:“念人家妇女,作息不倦,使避九月九日,勿用作事。”吴平后,其女幽魂思乡欲归。

永平元年九月七日,见形……求渡。……两男子笑共调弄之……丁姬曰:“谓汝是佳人,而无所知。汝是人,当使汝入泥死;是鬼,使汝入水。”便却入草中。须臾,有一老翁乘船载苇。姬从索渡。……径

渡之。至南岸,临去,语翁曰:“吾是鬼神,非人也,自能得过。然宜使民间粗相闻知。翁之厚意,……当有所得也。”……翁还西岸,见两男子覆水中……载鱼以归。于是丁姬遂还丹阳。江南人皆呼为丁姑。九月九日,不用作事,咸以为息日也。今所在祠之。^{[6]123-124}

虽然讲述的是江南九月七日不做事的风俗来历,但却以事件的主人公丁姑为核心。先介绍其身世以及不堪忍受婆婆虐待自杀的悲惨遭遇,又写了她死后显灵的种种事迹——借巫祝之口发言、惩治轻薄之徒、奖励忠善之人,最终被百姓奉为神灵。叙事中又以“九月七日”这个特殊的时间为线索,勾连起丁姑自杀,显灵,形成风俗一系列事件,使得叙事完整,条理清晰。这则故事类似于丁姑的一篇传记,完整地记述了她生前,死后,成神的经历,而且塑造了丁姑勤劳善良,惩恶扬善、悲悯百姓的形象。

干宝使用了“情节的编造”的手法来达到“叙述真实的效果”。

正是因为历史家的任务不应该只限于对事件做流水账式的罗列,更重要的是研究事件发生的来龙去脉,或是在众多孤立事件之间建立起某种联系,他们所考虑的是故事的合理性与完整性。^[17]正如上文所引《丁姑》一则故事,“吴平后,其女幽魂思乡欲归”作者无从得知,出自于猜度,但这个猜度使得“渡江”、惩恶扬善、还丹阳这几个真实的情节显得合理,反过来从这几个真实的情节来考察“其魂思乡欲归”这个虚构的情节也应为合理的,同时思乡欲归也为后边的惩恶扬善情节做好了铺垫。另外,丁姑死后借巫祝之口表达对天下女子的同情也实难考察,但这个情节是江南九月七日不做事风俗形成的基础,也是塑造丁姑形象的重要一笔。

其次,叙述者的介入。

在史传作品中,为了表明史家的观点,起到惩恶扬善的教化作用,叙述者经常会介入叙事,发表议论。“论赞”是常用的一种方式,“论赞”一词是刘知几在《史通》中对史传作品中作者在文末所发议论的一个称呼。《春秋左氏传》每有发论,假‘君子’以称之。二《传》云‘公羊子’、‘谷梁子’,《史记》云:‘太史公’。既而班固曰‘赞’……其名万殊,其义一揆。必取便于时者,则总归论赞焉。夫论者,所以辩疑惑,释凝滞……丘明‘君子曰’者,其义实在于斯。”^{[18]139-140}在刘知几看来,史传文末所发的议论是向读者辨析疑惑,解释难懂之处的,像《左传》中的“君

子曰”还在于表明作者的道德评判。

而《搜神记》中也有大量议论,用以表明作者的观点。

有些议论,是为了表明所叙述事件的客观真实性。如《江淮败属》记述了江淮之地有败属自聚于道的情形,文中作者介入叙述,称“余尝视之”^{[6]229},《张小》中作者称所记之事为自己外姊夫所亲历。这类似于司马迁在《李将军列传》中写“余观李将军,恂恂如鄙人”^{[12]2878},叙述者以亲闻亲历者身份介入叙述,以增强叙述的真实性和可信度。

有些议论则是为了表明自己的观点。如《吴郡晋陵讹言》、《京邑讹言》等篇,在叙述末尾作者加上了“此事未之能论”,这是一种不做评判的态度,而在其他叙事中,作者或显或隐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显者如《任侨妻》,其中记述了任侨妻产下一对连体婴儿,有人以“二人同心,其利断金”来解释这个现象,认为是四海同心之祥瑞。干宝在文末“君子曰”中对这种谬误的解释进行了嘲讽,同时勉励人们要不断学习,而他自己的观点在前文的叙述中已经摆明——“此盖天下未一之妖也。”^{[6]237-238}隐者则是借故事中的人物之口代言,发表议论,或与人辩驳,表明观点。

其次,简洁传神的语言风格。

从《春秋》开始,中国的史传文学就讲求语言的简练生动,“‘春秋笔法’的本质特征就是尚简用晦。”^[19]刘知几也极力称赞史传文学的这种语言风格——“夫国史之美者,以叙事为工;而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主。”^{[18]326}《晋书·干宝传》中称干宝著《晋纪》“其书简略,直而能婉,咸称良史”^{[4]2150}《搜神记》叙事同样简洁生动,语言朴素俊雅。如《鲁少千》:

鲁少千,山阳人。汉文帝微服怀金过鲁少千,欲问其道。少千拄金杖、执象牙扇,出应门。^{[6]35}

短短三十余字,便让一个不畏权贵,不贪财势的隐士形象跃然纸上。干宝非常巧妙地使用了“怀金”,“拄金杖、执象牙扇”几个词语,使之形成对比,这种对比又营造了巨大的想象空间,让人不由得去猜度鲁少千拄金杖的用意,达到了言简义丰的效果。此外《秦巨伯》中“老奴,汝某日捶我,我今当杀汝”^{[6]334}把不知高低的顽童的口吻模仿得神情毕现,《斑狐书生》中的狐精能文善辩,纵论古今,难倒了以博物著称的张华。所以此条记载文采斐然,酣畅淋漓,既符合了博学多才的人物身份,又是干宝“直而

能婉”的语言风格的体现。

综上所述,《搜神记》虽然在内容和体裁上与史传迥然相异,但在创作观念和行文笔法等方面都深受其影响。重史尚实的观念一方面束缚了虚构与想象的展开,对小说的发展与成熟有着消极影响,但作为小说的先驱,《搜神记》又从史传文学中吸取了大量宝贵的创作经验,其叙事技巧、人物塑造等方面得到了较大提高,《搜神记》被深深地烙上了史传文学的印记。

[参考文献]

- [1] 何悦玲. 中国古代小说中的“史传”传统及其历史变迁[D]. 西安:陕西师范大学,2011:21.
- [2] 杨伯峻. 春秋左传注[M]. 北京:中华书局,1981:663.
- [3] 班固. 汉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62.
- [4] 房玄龄. 晋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4.
- [5] 董乃斌. 中国古典小说的文体独立[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157.
- [6] 李剑国. 新辑搜神记[M]. 北京:中华书局,2007.
- [7] 杨义. 中国叙事学[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210.
- [8] 李泽厚. 说巫史传统[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
- [9] 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国语[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26—27.
- [10] 冯友兰. 中国哲学史[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6.
- [11] 上海古籍出版社. 十三经注疏[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2359.
- [12] 司马迁. 史记[M]. 北京:中华书局,1962.
- [13] 李长之. 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205.
- [14] 范文澜. 文心雕龙注[M]. 北京:中华书局,1962:287—288.
- [15] 李剑国. 唐前志怪小说史[M].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
- [16] 梁启超. 中国历史研究法[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19.
- [17] 王宇靖. 中国早期叙事文研究[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45.
- [18] 姚松,朱恒夫. 史通全译[M].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7.
- [19] 李洲良. 春秋笔法的内涵外延与本质特征[J]. 文学评论,2006(1):97.

[责任编辑 李兆平]